

我亲历的 1978 年全省中专招生统考命题工作

聊城市教育局 闫西岭



1990年8月闫西岭在他的书斋

1978年我的工作单位是聊城师专(或说是聊城地区师范,因为当时师专和师范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这年5月12日学校领导通知我:17日到省教育厅(即现在的省教育厅)报到,参加全省中专统一招生考试化学试题的命题工作,还讲:“让你去,是省里提名的,并经地区教育局和学校共同研究后认为你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都符合条件,同意你参加”。当时我曾想和省教育局的同志都不认识,省里为什么提名我参加全省招生考试命题这样重大的工作呢?后来我才知道,原因是在这之前,我给省教育厅教材处中学化学教材编写组写过一封信,对当时高中化学教材的科学性问题提出了18条修改意见。其中17条被采纳(我发言不久,省教材处就给我回了信——我至今还保留着,肯定了我的意见及17条被采纳的情况)。由此省教材处对我有了了解。

顺便说明,当时的中专是很吃香的,考上中专后,不仅能成为非农业户口(这是当时农业户口人员梦寐以求的),而且国家包分配,会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那时考上中专比现在考上大学本科都好。当时考上中专也不容易。就1978年而言,全省中专(含技工学校)共招收了38900人,而报考人数达135万多人,录取率仅为2.9%,即平均35人才有一人被录取。那一年在我省计划招收大学本、专、科生15560人,报考人数30余万,录取率约为5%,即平均19人录取1人。可看出当时中专的录取率比高校的录取率低许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那年初中生和高中毕业生都允许报考中专。

我按通知要求于5月17日到省教育厅招待所(现在的山东省教育大厦位置)报到。随后知道全省中专招生考试的科目为: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每科命题人员3人,组长1人,共计16人。命题工作并非马上开始,而是要先参加全省大中中专招生工作会议,并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学习。这是当年政治环境所要求的,也是那个时期的工作特点。18日上午参加了全省大中中专招生工作预备会议,18日下午至22日参加正式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思想是肃清“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的流毒,实现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会上还传达了全国大中中专招生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总结了我省1977年招生工作的经验教训;传达了我省1978年中大中专招生计划、政策以及某些具体要求和做法。会议主要由省教育厅副局长宁汉戈主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由高维真局长传达,其余文件、讲话由省招办负责人胡家骏处长和肇庆水副处长(以后曾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传达。会议还用两天时间进行分组讨论,共分大学、中专、地市三个组。我们命题人员先后参加了三个组的讨论。会议期间几乎每晚上都安排与会人员集体去看电影或戏剧(其中在山东剧院看了郭沫若编剧的蔡文姬)。这样的会议模式在那个时期很有代表性。

会上公布的1978年全国高校招收本、专、科生28.5万人,全国统一命题考试(1977年是各省命题),由各地市组织考试,各省级一阅卷;全国中专(含技校)招收45万人,由各省级一命题,县(区)组织考试,由地市级阅卷。文件规定,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考中专,但年龄不能超过22周岁。用现在的观点看,让高中毕业生报考中专是难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由那个时期的初、高中教育状况所决定的。因为“文革”期间,对基础教育提出的要求是“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片(管区),高中不出公社(即目前的乡镇)”。也就是说初、高中的数量非常多,师资力量极为薄弱。并且那个时期小学是五年制,初、高中都是二年制,而且要“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体力劳动占去了很多时间。这样的结果是初、高中数量多,而教学质量

低。在这种状况下,人们也希望中专既招初中毕业生,也招高中毕业生。为了避免因学生文化程度差别太大给教学带来困难,招生文件要求各中专在考生填报志愿之前,就明确公布本校是只招收初中毕业生,还是只招收高中毕业生,还是某些专业招初中生,某些专业招高中生。

5月23日省招办召开会议。当时的省招办并不是有编制的常设机构,是从省教育厅的某些处室及某些学校或单位抽调的人员组成(各地市、县区的招办也如此)。当年省招办主任是山东工业学院的刘敏同志,平时主持工作是省教育厅计划财政处处长胡家骏同志。这天的会议上,胡处长宣布了省招办的内设机构:行政组、大学组、中专组、宣传组、考务组、中专命题组,并宣布了各组的负责人及成员。命题组的组长是省教育厅高教处的齐滋忠同志(以后曾任省电化教育馆馆长),副组长是省教育厅教材处的王恩大同志(兼数学命题,以后曾任省教育厅副厅长、省电大校长),另一位副组长是昌潍地区(后来改称潍坊市)教师进修学院的于敬德同志(兼政治命题),其余13人分别选自高校、高中或中专等单位,年龄最大的是山师政治系的张季平教授56岁,年龄最小的是我32岁。这天的省招办会议还宣布,由于命题人员下步要处于长时间封闭状态,所以放假10天,6月2日在省教育厅招待所重新集合。

可以看出,当时参加命题工作是公开的,命题人员所在单位及家庭周围的人都是知道的,放假回家,命题人员的命题身份也不保密(省教育厅也没要求保密)。我回到家中和平时的生活。有关学校或老师也没有让我划考试范围或指考试重点,更没举办中考辅导班或作辅导报告之类(如果搞,会有千万学生参加)。当然也有极少数家长或考生让我划考试范围或出些打靶题,我一律婉言谢绝,无可奉告。

6月2日命题组重新集合后。学习讨论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一天,自由支配一天。5日上午宁汉戈副局长、胡家骏处长到命题组,年近70岁的宁副局长讲了他亲自寻找命题地点的情况和命题前应做的准备工作。命题地点是莱城县(当时属烟台地区)某部队招待所。出发时间定于6月10日。

6月6日和7日的工作议程主要是听取省教材处关于命题工作意见。教材处的同志首先介绍了我省近几年中学教材的版本及使用情况,介绍了我省去年招生考试命题的经验教训;对拟定的命题指导思想原则进行了讨论;发放了命题所需要的教材及有关教学资料。最终确定的命题指导思想是:(1)对教育革命有促进作用。因为当时是“文革”结束不久,“革命”二字还是要出现的语言,实际上是“贴标签”。至于“教育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如何命题才算促进“教育革命”,我认为大家都是不清楚的。(2)对中学教学起好指挥棒的作用。那时曾大讲高考,中考是教学的指挥棒。(3)有利于择优录取。确定的命题原则、要求是:(1)命题依据的教材以现行初中教材为主,但要结合往年教材。命题不能超出教材。要特别注意过去几年所使用不同版本教材共同的教学内容中选取命题。所以这样要求,是因为当时即允许应届毕业生报考,也允许过来几年的往届生报考,并且过几年,几乎每年使用的教材版本都不相同。(2)命题中基础知识(含基本原理)占40%,基本技能占30%,考察能力和有难度的综合性题占30%。也要考虑到有众多的高中毕业生报考。由于录取率低,所以试题要适当难些,并具体指出每100名考生中有2—3人能答满分(或接近满分)即可。当时预计的录取率为4%左右(实际录取率为2.9%)。(3)要使考生成绩拉开距离。(4)不出偏题、怪题。(5)凡看到的复习提纲、辅导材料等资料上的题在命题中不能出现。教材中的例题、习题不能正面出现。命题人员要下功夫,努力自行设计、自行编写考题。当时各地为中考、高考编写了大量复习资料。省教育厅让教材处通过多种渠道搞来许多复习资料交命题组,以便命题时避开这些资料上的题目。(6)命题要体现时代精神。(7)命题和答案要同时脱稿。命题及答案印刷时要由命题人员对版校对。所以有这一条,说是接受过保密的教训。

6月7日下午胡家骏处长主持召开命题组会议,宁副局长和高教处处长到会讲话(当时全省中专工作由高教处管理)。会议内容主要是:宣布命题组成立临时党支部,齐滋忠任支部书记,于敬德任副书记;着重讲了保密纪律。进入命题、印刷阶段后断绝一切个人的对外联系,试题要绝对保密。命题组对外称是编教材的,不能讲是命题人员。6月8日上午省文教卫生办公室(简称省文教办)副主任丁方明,作为省招生委员会(简称省招委)副主任会见命题组全体同志。他讲:“省招委主任高启云同志因公去青岛了,让我代表他和省招委来看望大家。”然后对命题工作讲了要求和希望。那时省招办是省招委的办事机构,全称是山东省招生委员会办公室。但省招委并不是有单独编制的实体机构,而是由省委、省政府领导及教育、财政、计划、公安、人事等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其办事机构——省招办设在省教育厅内。各地市、县区也是如此。这样招生机制一直延续至今。

6月8日下午省教育局长高维真会见命题组全体同志并共进晚餐。高局长除了对命题工作提出希望要求外,还讲了几句使大家印象很深的话。他说,你们的命题是肩负全省几千万人重托的工作,很重大,也很辛苦,是应该记大功的。今天咱们认识了,以后教育上有什么事都可以找我,

但我年纪大了,记性、眼力都不好,以后见了面,你们会认识我,但我不一定认出你们,届时,可不要说我架子大。

命题组6月9日10日休息,10日晚乘火车卧铺去烟台。11日在烟台地区教育局招待所吃早餐后,乘烟台地区教育局的车于上午10点到达命题地点:荣成县埠柳公社姚家山54702部队某团部招待所。此地向东离海边6里,向东南离旧荣成(城厢)12里。这个招待所很小,有近20间的平房组成,仅供部队的客人用。我们去后占用了独立的一排平房(含会议室),并由部队做饭夜站岗护卫。该团部还抽调水平高的炊事员为命题组做饭,伙食标准也很高。部队同志称我们专家。虽然我们讲是编教材,但团部领导心里都明白我们是干什么的。他们严格遵守纪律,不和我们交谈。但不断征求我们对食宿、服务等方面的意见,为我们积极创造好的条件。

命题工作是6月12日开始的,大家的工作十分投入。在阅看教材、资料的基础上。苦思冥想地自行设计、编写试题。特别是在试题难易程度、分量及如何拉开考生距离等方面下功夫最大。命题的方式基本上是各学科的三人每人首先各自出一套题,然后从三套题中选取都认为合适的题目组成一套试题,再经过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或者推倒重来这样一个讨论、研究过程,最后形成一套三人都感到能遵循省教育厅提出的命题原则和要求的试题(当时叫A组题)。接着再出一套B组题(又叫备用题),是在A组题被泄露的情况下才派上用场的递补题,其分量、难易程度等方面和A组题相当。6月22日命题及答案全部脱稿。然后将草稿纸等有试题信息的纸张全部销毁,不留任何痕迹。23日命题组由部队同志作向导乘车去成山角游览。那时成山角完全是天然状态,游人也极少极少,当然也不收费。

6月24日命题组的正副组长及部分组员回济南,向省教育厅领导汇报命题结果。留在部队招待所的同志可集体到附近海湾等地游玩。在该招待所期间几乎每周都和部队同志一起看电影。7月6日到省教育厅汇报工作的同志返回部队招待所,宣布命题被批准通过,进入印刷阶段。印刷地点是莱芜的某部队印刷厂。命题组的五位同志曾前去该印刷厂,负责试题的校对工作。当时没有激光照排,完全是铅字排版印刷,并将试题按每考场人数装袋密封。整个印刷厂封闭式管理,完全处于绝密状态,直到7月27日下午考试结束。

7月11日命题组告别54702部队招待所。中午在烟台地区教育局招待所用餐,傍晚到达莱阳农学院招待所。该院热情接待我们。在此一直住到7月21日。在这段时间命题组除学习一些中央文件外,集体参观了莱农的实验室、园艺场、农场和校办工厂;游览了莱阳县县城和著名芦岗莱阳梨林区;到海阳县莱阳山陵园瞻仰了革命烈士墓;到栖霞县参观了牟二黑庄园,当时叫阶级教育展览馆,在半年前刚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7月22日上午命题组离开莱农乘火车到达目前的胶州市(当时称胶县,属昌潍地区)住该县第二招待所,直到工作结束。23日集体去青岛游览,并在晚上和阅大专化学卷的同志一起到影院看了香港拍摄的电影《屈原》,夜12点回到胶县。

全省中专招生考试7月26日、27日进行。27日在胶县省招办为命题组进行了结束工作的一些安排:上午茶话会,中午宴会(当时叫会餐),下午总结座谈会。宁汉戈副局长、胡家骏处长等同志参加。中午的会餐有酒。这是命题组成立以来第二次有酒的聚餐(中午是高维真局长为命题组的送行宴)。当时的会议或活动用餐不上酒,没有酒是一种常态。大家都认为命题组有两次酒宴已经是高规格了。下午胡处长主持召开命题工作总结座谈会,宁副局长讲话,他重点讲到,从考场反馈的情况看,命题水平高、质量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命题、印题工作量大,时间长,没出现泄密,保密工作非常好,任务完成的很圆满。他代表省招委和省教育局对命题人员提出表扬,并通知所在单位。接着他讲,大家辛苦而出色的完成了这么重大的任务,应该发点纪念品。我们经过商议,决定每人赠送一套书,并强调说,赠书对学习和工作有益,不能说是“物质刺激”。年迈的宁副局长所以讲这番话,是因为那时的会议、活动或完成某项任务是不发纪念品、礼品或奖金的,而且“文革”时期大批“物质刺激”、“金钱挂帅”的影响还存在,还被扣上“不讲革命而搞物质刺激”的大帽子。接收者也怕被说成是“贪图物质利益,革命觉悟低”。当时大家从思想上也确实认为命题就是一项革命工作,也没有要求发礼品或钱财的想法。听到每人发一套由省招办签赠的书,都很满意。所发书是清末名著《官场现形记》(上、下册共1083页,定价2.65元)。据当时有关同志讲,买这套书还费了不少劲,跑几个书店才选购到的。原因是那时书店里的品种还很少,又想买点特色,平时不易看到的书,所以从几个书店才购到这套刚批准出版的《官场现形记》。总结座谈会最后(也是全省中专招生考试结束之时)宣布,历时70天的命题工作结束,大家返回各自的工作单位。

读者朋友,我如实(原汁原味)记述了39年前全省中专统一招生考试命题工作,和目前这类工作相比,你有什么感悟呢?

作者闫西岭:聊城市教育局退休干部,茌平县人,山东大学,研究成果(获奖)和著述颇丰。中学高级职称,聊城地、市拔尖人才。2014年被评为聊城市“最美公益老人”。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季,多少学子正在最后冲刺,这也勾起了我对1978年高考的回忆。

1978年上半年是我们高中毕业的最后一学期,但这一学期格外让人心潮起伏,也不是要毕业的缘故,1977年恢复高考,“忽如一夜春风来”,“文革”积压的万千知青可以改变命运了,场部下到我们生产队的刘跃进考上了“南京工业林产学院”,我们老师在高中部同事的儿子,下到糖厂的潘东晖考上了“清华大学”,我们这届应届毕业生要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了啊!1977年是各省命题,1978年全国统一命题高考,这一年是中国农历“马”年,给人的感觉,有万马奔腾之势。教育恢复高考后,千万学子(应属学生和社会青年)齐奔高考这座改变人生命运的“独木桥”,当年印象最深的两篇文章:郭沫若为全国科学大会的书面演讲和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将神州大地撩拨得异常兴奋和激越。

“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杰出的贡献。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民族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复兴。恩格斯在谈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更加需要大批社会主义时代的巨人。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革命的……”

可怜我们自1976年下半年开始在茶场学校读高中,三十来号同学,只剩了一个学期了,立马分成文理科,以前教育闹革命,教材只有薄薄的二三十页,一个学期并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学生经常要参加劳动,配合“运动”搞宣传,学生贪玩,老师也良莠不齐,甚至有教师把“盼星星、盼月亮”,读成“分星星、分月亮”,所学知识不连贯,先天营养不良,亏了小苗。数学知识是加减乘除和简单的代数几何,语文只有几百个简体字,古文仅从毛主席诗词中学到几个文言词语,要上考场真有点自卑,这就像“老鼠

难忘的 1978 年高考

上秤称,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幸运的是,教我们数学和语文的是傅刚石、汤蔚安老师,他俩均“文革”前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正宗科班生,算得上学校的“王牌”,傅刚石老师单瘦瘦,一脸清秀,带有邵阳洞口口音,讲课条分缕细,循循善诱,解题犹如玉手剥小笋,层层推进,实在是全心尽力,他白天要给我们上课,晚上还要辅导社会青年,星期天骑自行车去营田场部带领导及好友子女“加餐”,累的够呛,1977年湖南省高考试题一道解方程的题目,实际上就是“根与系数的关系”15分,傅老师说这是“韦达定理”,我们听得眼睛鼓成了鸡蛋,现在是初一年级的内容,班上数学成绩好点的同学还跟得上,不好的听得云里雾里,可见当时教育园地荒芜到了何种地步,学生文化知识掌握之少让人可怜,我们乡村学生连想象也是那么贫乏,以为“皇帝的好生活是餐餐用油炒着饭吃”。

汤蔚安老师一脸络腮胡子,黝黑的脸庞,崛起的嘴唇,给人以严肃和威严,他治学严谨,为人耿直,记得1976年下半年直到“国庆”节后才来我们学校任教,当时语文教材还未到,第一节课他仅拿一支粉笔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大的“语”、“文”,什么是“语”,什么是“文”,中国的“语”和“文”与外国的“语”和“文”有什么不同,古时的“语”和“文”与今天的“语”和“文”有什么差异,还举出一个例子,一个外国同学到我们当地,爱好汉学,在菜市场买蛋,居然用古汉语发问“鸡卵乎?鸭卵乎”他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我们听得目瞪口呆,汤老师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语文世界,我们都感叹这位老师知识丰富渊博。

当年高考文科五科目,语、数、政、史、地,1976年农场大办高中,“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各分场都办有高中,总场“高中部”的老师分散到了各分场,各分场各科老师不全,缺胳膊少腿,史、地基本上是自学,也没有教材,到处找文科资料和练习题,我有时还帮汤老师上钢板油印资料,其中有《岳阳楼记》、《陋室铭》等古文,他鼓励我们考上大学,每星期有免费电影看,伙食国家补贴,图书馆中外古今名著应有尽有,中国最美的大学座落于武昌珞珈山下,当时我想,要是考上“武大”,要看看它到底美在哪文科的同学普遍学懂“瘸腿”,史、地更差劲,一道“延安在中国哪个省”,居然有同学回答在“宝塔山下”,闹出笑话。

1978年高考日期是当年的7月7-8号两天,酷热的天气和师生的紧张情绪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因为有许多社会青年参考,有父子、兄弟、姐妹,师生同考场,我们茶场也设了考点,我当时分在了学校南边靠西的第一间教室,汤老师任监考老师,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基本上发挥出正常水平,印象深的是语文作文试题将一段文字缩写,“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其实就是将文字抽出主干,压缩内容,古文是一段“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纆’,妻适市来,曾之欲捕纆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无知也,特父母与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翻译其中三句,现在稍有古文常识的人不难做出,而对当时刚沾古文边的我们来说,准确译出确非易事。

历史试题有一道“扼要举出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得从小爱好文史之福,考后对照标准答案,应该得了一个满分。

最可惜的是考数学,因为第一次参加高考,也不知道评分是分步计算的,有一道三角函数基本运用关系题,已知a、β锐角,欲证a + 2β = π / 2,解了三分之二,因为没有全部做出来,只在草稿上演算,到点铃声一响慌慌张张没有写上试卷,这可是一道20分题啊!

汤蔚安老师巡视每个考生的答卷,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失望之情,他监完最后一堂考,来到我的考试桌前,略带慰藉之意说,“考完了,你回去等消息吧!”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考上大学对于我们这届应届毕业生来说,无疑是“骑自行车上月球”,加之数学考“塌”了,没有抱太大希望。

回乡上,16岁的我,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过了日上日而作,日落而息的回乡集体劳动生活,深翻茶园,锄草、打平剪、摘茶,单调而又乏味,对未来一片茫然。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从场部参加军训回来后来成为我舅舅的黎国光老师从马路边上下坡看到我收工后疲倦的坐在台阶上,十分惋惜地喊道:“周应明,你高中大专上线差了0.1分,没有上线”。当年大中专分开考试,大专没有上线,中专也读不了,大专录取线是305分,我考了304.9分,记得历史考了89.9分,数学36分,不知那0.9分从何而来,自此以后,我才成熟了许多,思考起自己的理想和未来,忽然间感觉自己长大了许多。过了几年,我在高中部任教,调到学校担任支部书记的谭步云老师从教师花名册看到了我的名字,特意从操场边叫上我,“你叫周应明啊,1978年我为了你0.1分中了复课区(那时没有建市)两趟,可惜没有办法上录取线。”我在四分局学汉语,邓雄老师经常告诫同学做题要细心,以我0.1分为例,不然“差之厘毫,失之千里”。

1978年高考也演绎了许多悲喜剧,最有代表性的是吴宗光先生(我大学学长),他当年与学生一同参加了高考,是当时岳阳地区文科类总分第二名,预录到北京师范大学,可体检,医生鉴定报告单上“未见血吸虫病”一句让他从“北京师范大学”跌落到“岳阳师专”,“未”字与“见”字相连,“未”字出头不明显,写成了“现血吸虫病”,这“血吸虫”在南方司空见惯,到了京城如同现在的“爱滋病”,左等右等不见通知,后来只能补录到师专。六分场郭胜斌历史考了近100分,录取到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多年后我在岳阳文史馆见了他,开玩笑说,我要是数学不考“塌”,有可能与他俩并在珞珈山下,樱花树下,为圆当年“武大”梦,我2003年特意到“武大”转悠了两天,这所美丽的大学让一个乡村少年魂牵梦绕啊!

1978年全国参考人数高达550万人,录取率不到5%,“高考”让千万人改变了命运,也是我们国家、民族走上新生之路的前奏,当年我虽然名落孙山,但也为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课。人的一生有几个重要节点,当然“金榜题名时”不能例外,可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我们民族走向光明坦途确实不易,这段历史不能忘记。(周应明)

古时的秀才,举人,进士,状元 如果放到现在应该是什么地位?

在古代成为秀才,就已经是国家认可的统治阶级的一员了。拥有免税免徭役,见官不跪,过堂免刑等特权。每次考核的最高一级廩膳生员,还可以享受国家补助,为地方上的童生作保。

秀才就相当于现在的985院校硕士,人数不少,许多村都能有1-2个。考不上举人、进士的话,可以当私塾先生混个温饱,官职没有,并且永远无法晋升。

举人出身已经算是“正途”了,如果能力没有问题,退休前升任知府是很有希望的,再往上发展就只能看个人造化了。另外,举人就算不出仕,也能享受国家津贴,还可以前庇他人免赋免徭役。

雍正以前大概可以免100-200亩的地税,十几户的徭役,就算举人老爷在家什么也不干,把免税免徭役的名额挂出去,也是个大财主。

进士,知识水平相当于现在的清华北大博士或博士后研究生毕业,举人中的优异者,一个县一届能有1-2个就很了不得,人数很少。官职大约是副县级,起步可以做县令,属于朝廷重点培养的后备官员,有能力,有运气的话可以晋升到封疆大吏、六部尚书甚至是大学士。

我国1300年的科举历史中,一共诞生了11万名进士,平均每年84人。进士分为三甲: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人数不定。

(来源:中国历史解密)